

孙中田 著

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史文库 主编：王 确

中华书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史文库 主编：王 确

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

孙中田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孙中田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5.9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史文库/王确主编)
ISBN 978-7-101-11144-6

I.论… II.孙… III.茅盾(1896~1982)-人物研究
IV.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6136 号

-
- | | |
|-------|---|
| 书 名 | 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 |
| 著 者 | 孙中田 |
| 丛 书 名 |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史文库 |
| 丛书主编 | 王 确 |
| 责任编辑 | 孙永娟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920×1250 毫米 1/32
印张 10 $\frac{1}{8}$ 插页 2 字数 290 千字 |
| 印 数 | 1-3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1144-6 |
| 定 价 | 38.00 元 |
-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史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编：王 确

委 员：张世超 苏铁戈 刘 雨 付亚庶
李德山 高长山 黄季鸿 宋 祥
李 洋 解 玲 王春雨

总 序

学术本身成为目的才会有真学术

就在前几年，大学期间和年轻时代的记忆越来越多地被唤醒，经常想起给我们上过课或有过学术及其他交往的学术前辈。他们教书的样子，他们学术研究的事件，激起我们重读他们留给后人的那些沉甸甸的文字的热情。上大学的时候虽然就知道这些前辈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学者，他们不仅是树在我们心中的一面面的旗帜，而且在全国乃至国际同行中享有盛誉。在重读这些前辈著作的时候，还是遭遇到了一种陌生和惊奇，不由得怀疑自己，怀疑我们这些后学的治学道路来。基于此，就想把前辈的学术选集起来重新与读者见面，以便更有效地释放榜样的力量。当时我作为学科带头人和院长，责无旁贷，便开始准备条件，与大家一起策划和推进这套书的出版事宜。现在，《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史文库》(以下简称《文库》)即将在中华书局陆续问世了，这意味着我们这些后学在实现着一种夙愿。

学术史不接受事实不清、更不接受罔顾事实的知识和观点。因为重读，领略到了前辈学者学术成就的不可多得。人文学术虽然不像科学那样，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而是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存在多

种观点甚至不同结论的可能，但不论有多少结论，都是朝向事实的差异和依据事实的不同判断。我们常说，欲研究某个学术题材，必先知道其有什么，而后才可谈是什么或为什么，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像孙常叙先生的《楚辞〈九歌〉整体系解》，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历时60年才拿出来出版；何善周先生的《庄子》研究虽在上世纪70年代末才与读者见面（《〈庄子·秋水篇〉校注辨正》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1期），到他发表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3期上的《〈庄子·德充符〉校注辨正》的时候就已经有25年的时间；王凤阳先生的《汉字学》历经30年时间，几经周折才最后完成，正如他所体会到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汉字学·后记》）；逮钦立先生的陶潜研究从发表于《读书通讯》1942年第50期上的《陶渊明行年简考》算起，到1964年载于《吉林师大学报》第1期上的《读陶管见》的20多年时间里，才完成了10万余字的陶潜研究文稿；苏兴先生的吴承恩研究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近30年时间里，除了订正增修了赵景深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1936年）和刘修业的《吴承恩年谱》（1958年），进而做成新的《吴承恩年谱》之外，也主要是完成了10万余字的《吴承恩传略》；孙中田先生的《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研究对象尽管是现当代作家，孙先生也与茅盾多有交往，但也花了20多年的时间才出版；张人和先生1955年就给杨公骥教授做助手，并参与了古代文学的一些研究工作，他的《西厢记》研究，仅从1980年投师《西厢记》研究泰斗王季思到他出版专著《〈西厢记〉论证》，有15年的时间。

我并不是说，研究的时间长就必然地会产生更出色的学术成果，但《文库》中的前辈活生生的研究历程和非凡的学术成就，却真的与他们长年累月的考索探求密不可分。学术史一再地告诉我们：研究的史料钩沉不仅需要孜孜不倦的努力，还要有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达成，这正如胡适喜出望外地得到《红楼梦》的“程乙本”，克罗

齐等待多年发现了鲍姆加登的拉丁文《美学》(Aesthetica)一样;同时,对研究题材深层逻辑的发现,不仅仅需要反反复复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还需要历经长时间的发酵,才会得其要领,发现意义,超越前人。

张松如先生评价孙常叙先生的《楚辞〈九歌〉整体系解》是“集六十年治楚辞《九歌》的心得创获,裁云缝锦,含英咀华,结成新篇”(张松如《序》)。王国维大概是最早提出《九歌》为“歌舞剧”的人,但沿其提法展开,研究者一直未见作为戏剧应有的自觉性完整结构。孙常叙先生在发现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之后《九歌》研究中的疑点基础上,大胆反思,扎实考证,洞察到《九歌》的整体有机结构,即由《东皇太一》、《云中君》两章构成的“迎神之辞”;由《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七章构成的“愉神之辞”;由《国殇》构成的“慰灵之辞”;由《礼魂》构成的“送神之辞”。又如在《九歌》相关的“庄蹻暴郢”问题上,作者“一时间疑窦丛生,百思莫得其解”(《楚辞〈九歌〉整体系解·自序》),被迫暂时搁置,在迂回路线,放开视野,沉淀发酵以及对文字的精深训诂中,终获新解。逯钦立先生对陶潜的研究真可谓一丝不苟,考版本,查史籍,对陶潜诗文真伪仔细辨别,明确了陶潜研究的许多问题,于是才有他特别为学界珍重的《读陶管见》等研究论文。冯友兰先生评价何善周先生的《庄子》研究说:“《庄子校注辨正》已读数则,真是前无古人。《庄子》原文费解之处一经校释,便觉文从字顺,真所谓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者。”(《冯友兰先生的来信》)又说:“闻先生的及门弟子中,唯有善周能继承闻先生研究《庄子》的衣钵,后来者居上,甚至能超过他的老师。”(《何善周先生传略》)闻一多先生1946年就离何先生而去,何先生的《庄子》研究新时期才开始发表,想想这是多么长久的积淀和承继。王凤阳先生的《汉字学》系统详实地深入讨论了关于汉字的知识、理论、历史文化等方方面面,建构

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最为详实的汉字学体系，是一部在海内外汉学中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它的丰富性和学术力量，主要来自于它几易其稿，历久弥新，深究细琢，最大限度地激发自己的所能，更广泛地汲取到学界新的成果。孙中田先生的茅盾研究之所以被境内境外的同行高度认同，也是作者在长期的积累过程中，从众多机缘里获得了更多的学术素材、事实和思想启示的结果。他的《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虽是只有近30万字的专著，但其研究背景却是全面而丰富的。关于茅盾的代表作《子夜》的讨论，在《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中大体上集中在其中一节的内容里，可后来作者将这部分专门写成了一本高质量的专著《〈子夜〉的艺术世界》，先是在199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付梓，2014年又由中国台湾地区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再版。

《文库》的前辈作者中，大部分我都接触过，记得他们经常说起有关治学的方法、学术思想和学术价值等等，但我不记得他们谈到过治学的目的。现在想来，对他们而言，仿佛如此治学是天经地义的，学术本身就是不言自明的目的，可我们今天经常会追问“治学为了什么”，经常会有人质疑治学的现状，质疑当下的学术体制，质疑学术研究的急功近利。重读这套《文库》，让我看到了那个时代学术研究的缩影，他们把学术成果作为自我人生的目的，而不是作为手段，把学术研究活动作为某种生活的方式，而不是仅仅作为谋生的路径。时代迁移，学术的应有尺度却不会改变，当今学术界不可忽视的急功近利倾向如此普遍不应是时代的必然产物，而是另有其他的人为原因（人们多认为这个根源来自于学术体制的不当力量），警惕急功近利应是每个真正学人的长鸣警钟。

学术史是一个知识增量的过程，那些重复前人的知识是没有资格进入学术史的。我们常说，好的成果要么有史料的发现，要么有思想的发现，最好的是史料和思想都有发现，归根结底是要有发现。从前辈们的研究及其成果中，我们也许能够体会到，虽然对新

的史料的发现也是一种学术价值，但一般而言史料的发现就可能会改变一种学术判断，生成一种新的学术思想，有时史料的发现又是在证明某种合理假设的过程中获得的，总之学术研究常常是综合的、复杂的，是史料发现与思想发现并存的。孙常叙先生不正是因为对王逸以后有关《九歌》研究“多所疑虑”，对“人神杂糅之解，君国幽愤之说，不能安矣”，才“尽屏旧疏，专绎白文，即辞求解，别无依附”（《楚辞〈九歌〉整体系解·自序》），对《九歌》展开了几十年的另辟蹊径的研究，从而发现了《九歌》11章的内部体系，在此基础上发现了《九歌》的创作意图和“隐含读者”。苏兴先生在遍查有关吴承恩生平和创作《西游记》的史料过程中，发现了学界认为《西游记》是吴承恩晚年创作的通行说法是有问题的，遂提出四点证据证明《西游记》为吴承恩中年时期开始创作或者完成初稿的作品，从而发现《西游记》与其他文献的具体关联，也为重新认识作品本身与作品之间的关系留下了空间（苏兴：《吴承恩传略·吴承恩的中壮年时期及写作〈西游记〉》）。在重读汪玢玲先生的《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研究》的那些天，不仅因其民间文学视角的阐释引导我看到一部别有洞天的《聊斋志异》，如同何满子先生所说：“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蒲松龄，过去虽也有人作过零星的尝试，但都没有系统地进行过。汪玢玲同志是专攻民间文学的，因此她从自己的专业出发，描画出了由民间文学土壤中培养出来的蒲松龄艺术的轮廓。她的努力给研究蒲松龄开拓了一个新的疆域，特别是对研究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她的实践经验。而这种经验，首先是她选取的角度，便有助于古代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工作的展开。”（何满子：《蒲松龄与民间文学》小引）而且，不由得自心底生出另一种感慨，感慨那一代人在充满不幸和挫折的人生情境中，依然在其行动中始终释放着浓厚的人文情怀。重读《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研究》，胡适的“双线文学史观”总是在我的脑海中平行地显示，因为我清楚，汪先生

的民间文学情结并非仅仅是一种学术题材和方向的选择，而是其历史观和人文态度的表现，这与作为五四文化先驱的胡适们对平民文学或民间文学的敬重来自于相似的思想动力。杨公骥先生的《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所讨论的学术题材实际上也是民间文学。杨先生从《敦煌掇琐》发现 28 首混抄在佛教劝善歌中的唐代民歌，并从出处分析、断年依据和民歌所反映的历史生活进行了有力的考释：说明了 28 首民歌所反映的唐开元、天宝时代中下层社会的真实面貌；证实了这些民歌“正史书之不当，补文献之不及”的史料价值；考论了《旧唐书》和《新唐书》的错误，以及唐开元、天宝时代社会经济崩溃、阶级斗争尖锐的真实情况（杨公骥：《唐民歌二十八篇考释后记》）。我想《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中的论文《论开元、天宝时代的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和《论胡适、杜威的历史伪造与实用主义的文学史观》两文，当是在上述 28 首民歌的考释基础上完成的。这两篇论文尖锐地质疑了胡适的看法，鲜明地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观点。其中的思想贡献自不必说，我们也不必去讨论学术观点的孰是孰非，只是这里的基于严肃考释、敢于怀疑和挑战权威的治学精神就显然特别值得我们后学追随，因为追求真理是治学的第一原则。张人和先生在谈自己的古代戏曲研究时，曾总结了许多有效的经验，其中的两个关键词“辨别真伪”与“贵在创新”，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在出版《〈西厢记〉论证》之后，经过仔细考证，深入思考，继续发表了关于《西厢记》版本系统，《西厢记》研究史，《西厢记》效果史等高屋建瓴的成果，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他过去的研究。王季思先生在评价张人和先生时引用了《学记》中的“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这句话，我想就是在喻指张先生在继承与创新上的特别表现。知识的增量正是在怀疑、证实或证伪中实现的，波普尔把“可反驳性”作为科学的核心尺度，正是告诉人们真正的知识既是反驳的结果，也是经得起反驳的结果。

就学术研究而言，无论是自觉的预期或是“无用之用”，其中都存在着某种效果的实现。学术不仅是发现新史料和新思想，还应致力于知识的传递，以及传递的效率和方法。在这套《文库》中，一部分著作是以系统的知识构成的，诸如曾任中国语文教学法学会会长的朱绍禹先生的《中学语文教学法》，罗常培先生的入室弟子李葆瑞的《应用音韵学》，曾任我校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等。这些著作里虽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地讨论知识，但字里行间蕴含着对更多读者的召唤，蕴含着传递知识的方法，蕴含着教学经验。尽管这样的著作有更多的读者阅读，这里的知识有更多的学者和教师一代接一代地研究和思考，因而更新升级的速度也相对快些，但他们的学术史价值是不可磨灭的。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创建于1946年，最初成立于辽宁本溪。1948年秋，东北大学与吉林大学合并，首先设立文学院，由张松如教授任院长，吴伯箫教授任副院长。历史上，古典文学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作者、著名诗人张松如，著名中国文学史家杨公骥，著名语言学家孙常叙，闻一多先生的高足、《庄子》研究专家何善周，中国现代诗人、鲁迅研究专家蒋锡金，现代著名小说家、学者李辉英，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家逯钦立，早期创造社成员、现代诗人穆木天，词学家唐圭璋，明清小说研究专家苏兴，东北作家群经典作家萧军，左翼文学家舒群，中国古典文学和红学家张毕来，现代文学研究家孙中田，新中国第一代语文教学法专家朱绍禹，都曾在我院工作过。张松如、吴伯箫、萧军、舒群等均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这套《文库》只是收入了一直在文学院工作到退休的前辈学者的部分著作，我们将努力使更多前辈们的著作以新的面貌与广大读者见面。

重读前辈著作时的感动真的是言犹未尽，但我必须留一点文字来表达我对为此《文库》的编辑出版付出辛勤汗水的各位同仁的深深

敬意。李洋院长一直作为编委会的前线推动者，为《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付出了非凡的努力，可以说没有他的付出，《文库》出版不会有如此效率和效果；解玲、王春雨、王军等老师为出版前的版权、编务等工作不厌其烦，辛勤工作；许多老师不辞辛苦，在肩负着繁重的科研、教学和其他任务的情况下，优先安排自己的时间来推进书籍的编辑工作，他们分别是：张世超、刘雨、付亚庶、苏铁戈、李德山、高长山、黄季鸿、宋祥、徐鹏等老师。在此，一并对他们的忘我工作致敬。

请允许我代表《文库》编委会特别感谢庞立生处长和社科处的同志们，感谢他们对《文库》出版计划的肯定，感谢他们在《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上给予的智慧和资金上的大力支持。

我还要代表学院特别感谢中华书局的申作宏编辑，他为《文库》的出版多次专程从北京来长春，商讨和处理出版前的各种问题，感谢他能以严谨认真的态度推进《文库》的出版工作。

《文库》真的要问世了。当我们这些后学的期待将要实现的时候，那种心情的确无法用喜悦能够释放出来。我们对《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史文库》的辉煌出版，翘首以盼。

在我这篇拙文准备收笔的此时此刻，前辈的学术生活在回忆和想象中仿佛历历在目，于是，耳畔萦绕着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声音，尽管我知道这声音原本是说给君主的治天下之道，但细细倾听，反复想来，直面当下学人学术，倒是深觉这声音亦是引学人和学术去光明之处的呼唤。如此，我不妨把这并不陌生的声音录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非淡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淮南子·主术训》）

王 确

2015年4月26日 于北海新居

绪 论

在“五四”以来的文学战线上，茅盾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和革命战士。他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新文化旗手鲁迅等同时代的革命作家在一起，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新时期，为新文学的健康发展、为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准则、为文学服务于民族解放和人民大众的革命事业进行了不懈地斗争。在左翼十年的文艺运动中，他是坚强的骨干力量，他和鲁迅在一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坚持阶级斗争、思想斗争，为维护无产阶级文艺的胜利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日子里，他更以多方面的文学活动，团结一些革命的进步作家，为实现党的各项任务而奋斗。据何其芳同志回忆，敬爱的周总理在谈到茅盾同志时，对于文学研究会的活动是肯定的。肯定它“起了好的作用，进步的作用”，也肯定了茅盾同志“在文学工作上的成绩”^①。

茅盾的创作是以深广的社会生活的描写、清晰的时代风云的展示、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反映而引人入胜的。他以敏锐的视觉不断地在作品中提出一些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问题，并力图形象地揭示出某些方面的本质，反映出历史发展的趋势。宏伟而不失空旷，工细又不失之于纤弱，得阳刚之气和写实之风。就三十年代峥嵘高

^① 《回忆周恩来同志》，《文学评论》，1978年第1期。

昂的革命文学派来说，他以工细真切的描述而构成上乘；在不同流派作家中，又以高远的风骨而引人注目。他博采中西之长，把现代的中国小说提升到现代化的里程。在他许多血肉关联的作品中，映现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的生活变动，映现出人民群众迫于黑暗的重压、挺而抗争的艺术画面。其中，《霜叶红似二月花》可以放在首位，它映现的是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的社会景象；《虹》反映的是“五四”到“五卅”历史进程中的事件；《蚀》概括的是二十年代，即大革命年代部分小资产阶级的状貌；长篇《子夜》则提供了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三十年代初）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艺术画面。如果说《第一阶段的故事》中展现的是抗战初期的生活景象；那么《腐蚀》中揭露的则是抗战中期国统区特务横行、豺狼当道的现实；而剧本《清明前后》揭示的则是三四十年代抗战胜利前夕黑暗社会的状貌。由此可见，大时代的风涛、人民革命运动的起落消长、帝国主义侵略的魔影、旧中国的腐败黑暗的景象，在茅盾的创作中或则正面或则侧面，强弱不同地反映出来，构成形象的时代生活的历史。

自然，对于典型人物及其命运的刻画，始终是作家探求和注意的中心。茅盾说，“人”是他写小说的第一个目标。这是作家为自己规定的特殊任务。在他的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是异常广泛的。在这个形象体系中，有洋场买办、形形色色的资本家、封建地主劣绅，以及反动统治阶级腐蚀下“鬼也不如”的爪牙；作品中也出现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以及为灾难和苦痛折磨着、日益觉醒起来走向斗争的工农大众。在众多的人物中，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典型刻画是颇具生命力的，它在现代文学的艺术画廊中具有深刻的认识作用和美学价值。

在探索茅盾的创作时，可以看出，他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生活体察和艺术准备而走向实践的。鲁迅曾用“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神结想，一挥而就”概括自己的创作经验。茅盾从《蚀》到《清明前

后》的创作证明，离开了生活的泥土，艺术的创造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且不说《子夜》的生活体察过程，在写第一部小说《幻灭》时，茅盾告诉我们，他不仅熟悉“一九二八年以前那几年震动全世界全中国的几次大事件”，乃至“凝神片刻，便觉得自身已经不在这个斗室，便看见无数人物扑面而来”。^① 这生动的实例，都是对于先定主题、后设矛盾、远铺近垫等一套主观唯心主义创作模式有力地批判。

文艺创作离不开现实的斗争生活，也需要从古代和国外的优秀作品中吸取补养，只有“博采百花，才能酿出蜜来”。还在少年时代，茅盾就和先秦以来的文学典籍有了接触。特别是明清以来的小说，如《西游记》、《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都是他所喜爱的作品。至于外国文学著作，茅盾涉猎和研究得更为广泛。他不仅是外国文学的介绍者，而且是最早的研究者之一。英国的狄更斯、斯各德，法国的莫泊桑、左拉，俄国的托尔斯泰、契诃夫，以及欧洲许多弱小民族的进步文学作品，都影响了茅盾的创作。茅盾从中不断地汲取了进步的思想、严峻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精细入微的刻画人物的技巧。

回顾“五四”以来的文学发展历史，似乎许多老作家都以多方面的才能服务于革命现实。鲁迅是这样，郭沫若是这样，茅盾也是这样。茅盾从“五四”时期起便倡导文艺理论，开展社会批评，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他是现代文学最早的评论家和翻译家之一。稍后便展开创作活动。他写小说、散文，也写下了大量的杂文。这些工作，都是从时代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中汲取了力量，并且紧紧围绕着时代、社会的需要有所为而发的。他的许多杂文的写作是这样，他的一些论文、文艺批评，也是适应文学发展的需要写下的。甚至他

^① 见茅盾的《我的回顾》与《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

的长篇小说《子夜》，也分明是为了回击托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歪曲而写的。恩格斯在《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中说：“……某个作家有一点点天才，有时写点微末的东西，但如果他毫无用处，他的整个倾向、他的文学面貌、他的全部创作都一文不值，那么这和文学又有什么相干呢？”^①茅盾的创作实践证明，他并非像恩格斯所批评的“有一点点天才，有时写点微末的东西”的作家。而是几十年如一日，以不倦的创作劳动，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适应着革命的需要不断前进的革命战士的形象。

可以看出，茅盾在革命发展的进程中，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是有过苦闷、经历过艰苦的历程不断前进的。这实际和“五四”时期老一辈作家走向革命的经验汇总一起，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某些重要特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但是如何为人民群众呢？这个方向和道路是经过长期的探求过程才明确起来的。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指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②茅盾的文学道路的艰苦历程，分明地显现了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征程的某些特点。回顾前进的道路，茅盾说：“路不平坦，我们这一辈人本来谁也不会走过平坦的路，不过，摸索而碰壁，跌倒又爬起，迂回再进。”^③这体会是深刻的。正是不断探求真理、曲折再进的革命精神，使茅盾在创作道路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为杰出的作家和革命战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525页。

② 《毛泽东论文艺》。

③ 茅盾：《回顾》，《解放日报》1945年7月9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早期的思想和文学活动	(1)
第一节 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	(1)
第二节 早期的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	(8)
第三节 文学理论的倡导	(16)
第四节 文学评论和翻译工作	(31)
第二章 大革命前后的生活与创作	(40)
第一节 革命与文学活动	(40)
第二节 三部曲《蚀》	(44)
第三节 《从牯岭到东京》及其他	(55)
第四节 从《蚀》到《虹》	(61)
第三章 左联时期的创作	(66)
第一节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	(66)
第二节 长篇《子夜》	(84)
第三节 短篇小说的创作	(116)
第四章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创作	(136)
第一节 为民族和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136)
第二节 长篇《腐蚀》	(152)
第三节 散文的创作	(165)